



# 何以妖孽：对清代民初《文选》派的 “考古学”考察

郭宝军

**摘要：**由辞章到学术，再由学术到辞章，是姚鼐一生两次重要的文化转向。姚鼐最先以辞章名世，拜师戴震被拒刺激他由辞章转向考据，然其考据实践及四库馆中被边缘化经历又促其从考据回归辞章，并汲汲营构了一个与汉学相抗衡的桐城文派的文统。桐城古文的兴盛及古文为文章正宗的理论促使阮元诸人从小学、《文选序》诸方面正本清源，欲将古文驱逐出文之系统，以此确立骈文的正统地位。桐城古文与骈文之争持续至清季民初的北京大学，以桐城派的最终退出北大讲坛结束。新文化运动则将二者视为“妖孽”、“谬种”，作为旧文化典型一并驱逐。骈文、古文，相争相成，本质是汉宋之争；新文化运动与《文选》派、桐城派之争，根本则在新旧之争。诸种对立冲突源自“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

**关键词：**《文选》派；桐城派；选学妖孽；清代；民国

**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1.04.017

**收稿日期：**2020-05-2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选汇校汇注”(14ZDB06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郭宝军，男，山东淄博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选学与传统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唐前文学与文献研究，E-mail: baojunguo10@163.com。

1917年2月发行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通信》栏目中刊登了陈独秀与钱玄同等人有关“文学革命”的通信，钱玄同的来信最为激烈，发明了新文化运动推翻旧文化的响亮口号“选学妖孽”、“桐城谬种”<sup>①</sup>。尽管钱玄同“选学妖孽”最初所指实乃师出同门但主张迥异且善骂的黄侃，不过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渐趋深入，这个最初有固定指向的口号逐渐跳出其狭隘所指，内涵在无需说明中逐渐扩展为整个《文选》派，进而扩展为整个骈文派，乃至等同于古代全部骈律文献，俨然代表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理所当然地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投枪与匕首的锋刃所向<sup>②</sup>。不过，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选定“选学”作为攻击的靶子？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将历史时段区分为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三种。长时段指百年以上地质学时间概念，关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起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格局、文化系统等，“某些结构有很长的寿命，因而它们成为经历无数代人而稳定不变的因素”<sup>③</sup>。年鉴史研究专家多斯将长时段的优势概括为：“它可分解为若干个不断反复的事件系列，这些事件系列能持续显示出被混乱事实所掩盖的平衡和普遍规则。”<sup>④</sup>而法国另一位史学家傅柯(福柯)则强调历史学必须放弃宏观综合，转向

①《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海群益书社民国六年(1917)二月一日发行，第12页。

②“选学妖孽”口号生成及内涵转换的详细过程，详见：郭宝军《“选学妖孽”口号的生成及文化史意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13—119页。

③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④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106页。

零碎的知识,发掘众多不连贯的瞬间<sup>①</sup>。两位同样伟大的史学家,一个强调总体,一个关注碎裂。当然,本文无意弥缝布罗代尔与福柯之间的理论罅隙,而是借鉴、糅合两位史学家的某些思想,即不但要关注长时段,还要关注若干不连续的瞬间。在长时段的历史中,关注稳定与反复;以考古地层挖掘的方式掘取几个不连续的历史碎片,重构系列,借此追究《文选》派被妖孽化的长时段过程。

### 一 天下文章出桐城

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二十七日,戴震离世。此前12天是刘大櫟80岁生日。远在扬州主持梅花书院的姚鼐未能亲临枞阳现场,只得寄书遥祝业师寿辰,书云:

曩者鼐在京师,歛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既应二君,其后尝为乡人道焉。

鼐又闻诸长者曰:“康熙间,方侍郎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邪? 邑子刘生,乃国士尔!’闻者始骇不信,久乃渐知先生。”今侍郎没而先生之文果益贵。然先生穷居江上,无侍郎之名位交游,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独闭户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聪明犹强,著述不辍,有卫武《懿》诗之志,斯世之异人也已。

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学文于先生。游宦三十年而归,伯父前卒,不得复见。往日父执往来者皆尽,而犹得数见先生于枞阳。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平,扶曳出与论文,每穷半夜。

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为之寿。鼐适在扬州,思念先生,书是以寄先生,又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也。<sup>②</sup>

这是一篇寿序。撰写寿序总得要竭力表彰过寿之人,故易落俗套,这篇寿序却写得很不平凡,“摇曳多姿”,“确实是绝佳礼品”<sup>③</sup>。其不平凡处有二:一是构建了桐城派的传承系统,为桐城文章立派;二是文统的建构颇具“心机”,均借他人之口确定桐城派的传承代表。借周永年、程晋芳之口凸显方苞、刘大櫟,借方苞之口凸显刘大櫟,借刘大櫟凸显姚鼐自己,且隐然蕴有一代更比一代强、桐城派必将发扬光大之意味。

姚鼐的祝词颇具言外之意。虽不甚清楚程晋芳、周永年的“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具体语境,然其略含疑问的语气是可以感知的。此或为三人闲谈时的脱口之语,随意说说而已<sup>④</sup>。不过,五六年前的一次闲聊以及当时姚鼐对桐城人杰地灵之底蕴、学术盛衰演变的回应,经姚鼐郑重其事地回忆和反复陈述,彻底坐实了这样的结论:天下文章出桐城。此语的言外之意即:舍桐城外无文章,只有桐城派才允称文章正宗。姚鼐为什么会借此提出如此“狂妄”的断语呢?

通过对桐城文统的构建,姚鼐意欲证实两个相互关联的命题:一是华夏千古文章正宗在桐城,二是华夏千古圣道之传在桐城<sup>⑤</sup>,而后者从较早的方苞就开始申述。方苞为文讲“义法”,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sup>⑥</sup>,但他并未有为桐城文章树派的强烈意图。姚鼐辞却四库编修南归主持书院不久,即借为业师祝寿之机构建了桐城文派的传承系统,这个系统通过两年后编纂的《古文辞类纂》以及《祭刘海峰先生

① 米歇·傅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73—80页。

②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115页。

③ 陈平原教授对此序有详细的文本解读,详见: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2—209页。

④ 李祥云:“乾隆中程鱼门与姚姬传先生相习,谓:‘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此乃一时兴到之言,姬传先生犹不敢承。”见:李详《论桐城派》,《国粹学报》1908年第12号。后李详收入文集时对此文有所修订:“乾隆中程鱼门与姚姬传先生善,谓:‘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姬传至不敢承。”见:《李审言文集》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87页。虽李详写此文时间距姚鼐撰写《寿序》时间百有馀年,文章后亦有所修订,然其所言,似颇有道理。郭绍虞亦承袭此说,认为“‘桐城派’之名称,起于程晋芳、周永年诸人之戏言”。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⑤ 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⑥ 王兆符《方望溪全集·序》,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页。

文》、《刘海峰先生传》等文，进一步强化。虽然姚鼐构建的桐城文统，未免含有牵强、夸张与虚饰之处<sup>①</sup>，但他构建的韩愈—欧阳修—方苞—刘大櫆—姚鼐的文统，为确立桐城派的正统地位，奠定了初始化根基。桐城派能够成为有清一代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文派，与姚鼐的文派意识及其构建努力绝对是分不开的。

将文人闲谈的私人话语移入公共空间，并以《寿序》得体的形式<sup>②</sup>，似乎在不经意间，姚鼐就构建了一个流派——代表天下文章正宗的桐城派。然而，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姚鼐的看似不经意，其实“很经意”。他辞却四库馆职出京不久，就汲汲营营地程朱之学的旗帜下构建桐城文统的背后，隐然有与汉学派抗衡的直接动机。

## 二 汉学宋学不两容

从稍长的历史时段考察，清代学术史上的乾隆十九年(1754)是一个标志<sup>③</sup>。这一年三月，早以辞章知名的姚鼐第三次礼闱报罢，而这次礼部会试，在清代科举史上“最号得人”<sup>④</sup>，此榜录取了18世纪的五大汉学家：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纪昀、朱筠<sup>⑤</sup>。时秦蕙田寓居京师，主持《五礼通考》，嘱王昶修《吉礼》。卢文弨、翁方纲等任职京师。钱大昕、王鸣盛、王昶曾从学于惠栋之门。戴震也于此年避仇入都，王鸣盛、钱大昕、朱筠、纪昀、卢文弨、王昶，皆折节与戴震交<sup>⑥</sup>。这些后来以汉学著称的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汇聚京都，云蒸霞蔚，成为较长历史时段中宋学向汉学转变的一个标志。

此前以辞章知名的姚鼐，敏锐地触摸到了时代学术转变的脉动，深受礼部初试时结识之挚友朱筠的影响与劝勉，自觉地开始学术转型<sup>⑦</sup>。最能昭示姚鼐学术自觉转向者，当属他意欲师从戴震、乞列门墙之事。

乾隆二十年(1755)秋，姚鼐呈书戴震，表达拜师之意。没想到的是，戴震婉拒了他的请求：

日者，纪太史晓岚欲刻仆所为《考工记图》，是以向足下言欲改定。足下应词非所敢闻，而意主不必汲汲成书。仆于时若雷霆惊耳。自始知学，每憾昔人成书太早，多未定之说。今足下以是规教，退不敢忘，自贺得师。何者？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

仆于《考工记图》，重违知己之意，遂欲删取成书，亦以其义浅，特考核之一端，差可自决。足下之教，其敢忽诸。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昨辱简，自谦太过，称夫子，非所敢当之，谨奉缴。承示文论延陵季子处识数语，并《考工记图》呈上，乞教正也。<sup>⑧</sup>

姚鼐拜师之书今虽不见，但通过戴震的回复，约略可知姚鼐书信的大体内容：一言戴东原不必急于刊刻《考工记图》，应该会讲一些理由；二言拜师之意，自然要先表达对东原先生学术崇拜之意；三附己作上呈东原，请求赐正，实亦有向戴震略微展示才学之意。戴震为什么会婉拒姚鼐的请求呢？

第一，戴震对姚鼐有关《考工记图》的见解及规劝不必汲汲成书很不认同。姚鼐对《考工记图》的意见从此书刊成后他写的《书考工记图后》亦可略见。“休宁戴东原作《考工记图》。余读之，推考古制信多当，然意谓有未尽者”，“今戴君谓较鞫不重者，失之矣”，“凡戴君说《考工》车之失如此。其自筑氏而下，亦间有然者。

①王达敏认为：姚鼐在构建桐城文派之前，对方苞并无多大敬意，二人的文学趣味、治经范式也颇有差异。而刘大櫆的学问与方苞是否相干，该不该在桐城文统中占据一席之地，即使在当时桐城派内部也是很有争议的。参见：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107—113页。

②陈平原说姚鼐通过《寿序》这种文体，“既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又不太得罪人——给我老师祝寿，多说两句好话，总不要紧吧？”见：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第208页。

③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12页。

④纪昀《前刑部左侍郎松园李公墓志铭》中云：“公与余同以乾隆甲戌登进士。是科最号得人。”《纪晓岚文集》，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页。

⑤乾隆十九年甲戌科榜共录245人，王鸣盛为一甲第二，纪昀二甲第四，王昶二甲第七，朱筠二甲第十八，钱大昕二甲第四十。参见：王庆柏编著《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20—521页。

⑥杨应芹《段著东原年谱订补》，《戴震全书》（修订本），第7册，杨应芹、诸伟奇主编，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47页。

⑦关于朱筠对姚鼐的劝勉与影响，详见：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12—13页。

⑧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370—371页。

然其大体善者多矣。余往时与东原同居四五月,东原时始属稿此书,余不及与尽论也。今疑义蓄余中,不及见东原而正之矣,是可惜也”<sup>①</sup>。姚鼐此文虽在拜师被拒之后写成,然此前他与戴震亦有一段交往时间,知戴震正撰写《考工记图》。姚鼐拜师书信中规劝东原不必汲汲成书,可能会有匆忙成书不尽完善之说。姚鼐此说之意图或有借此向戴震展示自己在学术方面亦略有见解、可以忝列门墙的意味。不过,戴震对此规劝并不完全认同。在自贺得师的谦虚客套后,戴震从治经有“十分之见”、“未至十分之见”说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传信不传疑、疑则阙两个方面,力证治经不可能面面俱到,以不知强为知,反而徒增后人疑惑,对治经有害。此亦后人总结的乾嘉学者精深之研究。在此之后,戴震说自己的《考工记图》虽然义理浅显,仅考证了其中的一个方面,但自己还是能够判断对错的。这话看似委婉,其实也不客气。因此,对于姚鼐的规劝,戴震并未接受。当然话还得说客气一些,但戴震已经拒绝了姚鼐的拜师请求。

第二,戴震对姚鼐的学术趋向并不认同。如果仅仅因为姚鼐的规劝就拒绝其拜师请求,那或小瞧了戴震的器量。通过书信往复探讨学术,是乾嘉学者惯用之方法。因此,戴震拒绝姚鼐的拜师,深层原因在于二人的学术趋向、路径的差异。姚鼐拜师之前已颇有声名,但主要在辞章方面。尽管受到好友朱筠的规劝以及对当时学术转移的敏锐把握,姚鼐对已往沉溺的辞章之学有所反思,“古圣垂教宏且远,六籍俱存可说诵”,“歧路久已深余恐,但望植学培根柢”<sup>②</sup>。他欲拜戴震为师,恐亦有此意图。此前戴震与姚鼐交往有间,对姚鼐已有所了解,学术转型不可能遽然实现。以戴震回信中提及“承示文,论延陵季子”云云推测,此文恐亦一篇典型的桐城史论或人物论,或浸润了浓厚的桐城古文气,戴震书有识语,或对此文有所订正。戴震对辞章之学是颇为鄙视的,他在乾隆二十年(1755)写给好友方希原的信中,对方氏肆力于古文之学提出了批评规劝:“仆尝以为此事在今日绝少能者,且其途易歧,一入歧途,渐去古人远矣”,“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sup>③</sup>。在戴震看来,他与姚鼐的学问之途是迥异的,姚鼐所从事者是“等而末者也”。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何况要揽入门下!故戴震非常客气地拒绝了姚鼐的请求。

姚鼐满腔热情地拜师戴震被婉拒后,对双方,尤其是姚鼐,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王达敏先生对此作过考索,认为“拜师见拒不但没有中断他与戴震之间的学术交往,甚至毋宁说,此事坚定并推动了他从辞章向考据的转移”<sup>④</sup>。需进一步申说的是,虽然姚、戴之间的学术交往没有中断,姚鼐对此“心存芥蒂”的可能不是没有:他的拜师书信未见遗存,或姚鼐已经有意销毁;他从此再也没有提及此次拜师之事,却坚定地转向考据。戴震治地学,姚鼐亦治地学;戴震研礼学,姚鼐亦研礼学;戴震发明一条,姚鼐就补充证据。这当然可以理解为姚鼐对戴震学问的崇拜与踵武,背后未尝没有被拒后与之“较量”的心理因素。

随着姚鼐对考据之学的深入了解与实践,加之当时汉学家尤其是戴震釜底抽薪“诋毁”程朱理学的研究及深广影响<sup>⑤</sup>,戴震有“欲夺朱子之席”之势<sup>⑥</sup>,姚鼐对此深有警惕与反思。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馆,戴震、姚鼐均任纂修官。时汉学已如日中天,宋学背景的姚鼐尽管也有经学考证之作,但不为当时汉学界认可。他对馆臣极力表彰汉学、排诋宋学深为不满,与以戴震为首的汉学派的论争就不可避免。姚鼐后来回忆说:“然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为至,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鼐往昔在都中,与戴东原辈往复,尝论此事。”<sup>⑦</sup>其尊宋排汉,独立不惧,“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

①姚鼐《书考工记图后》,姚鼐《惜抱轩诗文集》,第76—77页。

②姚鼐《惜抱轩诗文集》,第415页。

③戴震《与方希原书》,《戴震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372—373页。

④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17页。

⑤戴震在给段玉裁的书信中总结治学之路时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戴震《与段茂堂等十一札》,《戴震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531页。

⑥王国维《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80页。

⑦姚鼐《复蒋松如书》,《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六,第95—96页。

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sup>①</sup>在四库馆内姚鼐与戴震诸人的这场论争，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严重不对等态势。从朝廷而言，乾隆皇帝是尊崇汉学的；四库馆内，汉学家云集，姚鼐是孤独的，处于一种被边缘化、受排挤的窘境。姚鼐的孙辈姚莹书写姚鼐当时的处境云：“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掎击讪笑之不遗余力。公往复辩论，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从也。”<sup>②</sup>其撰写之提要亦被大为删改<sup>③</sup>。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在四库馆内孤立无助的姚鼐，借口疾病辞馆出都<sup>④</sup>。

乾隆四十一年（1776）秋，应淮南转运朱孝纯之邀，姚鼐到扬州主持梅花书院。第二年五月，戴震去世<sup>⑤</sup>。就在戴震去世前十二天，姚鼐借给刘大櫟祝寿的时机，提出了“天下文章出桐城”的口号，两年后又编纂了《古文辞类纂》，先后在扬州、安庆、南京等地致力于书院讲学，通过此后的一系列文章，全面建构了韩愈—欧阳修—归有光—方苞—刘大櫟—姚鼐的桐城古文文统，孔、孟、韩、欧、程、朱以来的道统，为确立古文为文章正统的观念提供了两点理论支撑。

如果说，姚鼐意欲拜师戴震前对汉学尚心存仰慕，并自觉地由宋学转向汉学，那么，他拜师被拒后的考据实践不被当时学界主流认可、四库馆臣时期与汉学家有关程朱之学的严重分歧以及被排挤出馆的不堪经历，促使他重新反思汉学、宋学，再次转向辞章，并竭尽所能地对汉学猛烈开火，甚或谩骂诅咒不遗余力：

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sup>⑥</sup>

被耻笑、被边缘化、被无视的姚鼐起而辩争、抵抗、攻击、谩骂，亦成为他亲立门户的直接动力。正是因为姚鼐与戴震诸汉学家的分歧与论辩的经历，促使他重新梳理桐城文章，汲汲为桐城文章扛旗立派，建门立户，以抗衡汉学；正是因为姚鼐从辞章到考据，再从考据复归辞章的学术实践经历，促使他修正桐城前辈的理论疏忽，完善桐城文章的创作理论，在义理、文章之外增加考据，这是姚鼐转向考据以后以及与汉学家往复辩论的思索成果，由此也给桐城古文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嘉道时期的古文繁盛奠定了基础。

### 三 除却骈体不是文

汉、宋之争为学术之争，在文章上则表现为骈、散之争。桐城派早期代表方苞曾明确提出古文必须雅洁，“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sup>⑦</sup>。其中的“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指的就是骈文。在清初的文坛上，古文因其依附的程朱理学与清廷倡导的思想契合，被视为

①姚鼐《赠钱献之序》，《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七，第111页。

②姚莹《姚氏先德传》卷四《儒术》，姚莹《中复堂全集》第28册，同治六年刊本。

③《惜抱轩书录》是姚鼐于四库馆撰写之提要，刊行时李兆洛识语云：“颁刊之本时有差异，盖进呈乙览时总裁官稍润色之，令与他篇体裁画一焉。先生刊文集时不以此入录，当以各书所编订业见采于总目。”见：姚鼐《惜抱轩遗书三种》，光绪五年刊本。叶昌炽曾以他本校四库本发现“十仅采用二三”。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8页。

④姚鼐《登泰山记》云：“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颖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馀。”《游灵岩记》云：“泰山北多巨岩，而灵岩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来观之。”从姚鼐辞馆不久即长途跋涉至泰安，于除夕夜登泰山，正月初四游灵岩诸情形来看，姚鼐身康健，因病离馆，借口而已。二文见：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十四，第220—221页。又翁方纲《送姚姬川中郎归桐城序》中云姚鼐以“养亲去”，察其行踪，亦是借口。翁方纲文中尚云：“窃见姬川之归，不难在读书，而难在取友；不难在善述，而难在往复辨证；不难在江海英异之士造门请益，而难在得失毫厘悉如姬川意中所欲言。姬川自此将日闻甘言，不复闻药言，更将渐习之久，而其于人也，亦自不发药言矣。”姬川，即姬传。翁方纲这段文字，有对姚鼐明显的规劝批评意味，由此亦约略可知姚鼐当时在四库馆中的窘境。参见：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

⑤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丙申（1776）冬戴震与孔继涵书中云自三月患足疾至冬天仍不能行动，孔氏感叹盖先生用心过劳至于痿痹而不自止，病已深矣。丁酉（1777）四月二十四日戴震作札与段玉裁云，仆足疾已踰一载，不能出户。五月二十一日作书段玉裁云前月二十六日至今一病几殆云云，竟被庸医所误。参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七年重刻本。戴震离世虽早于姚鼐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十馀天，但二者时间节点相近，因此从桐城文派的构建层面而言，戴震的离世也具备某种强烈的象征意味。

⑥姚鼐《再复简斋书》，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六，第102页。

⑦沈廷芳《方望溪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98册，第539页。

文章正宗。不过,随着汉学的崛起,乾嘉学者精审研究的不断深入,宋学的缺陷愈益明显。依附于宋儒的这种散行单句之文也因此成为抵制的对象,乾嘉学者倡导骈文,以此对抗古文。一般而言,骈文需要征典,汉学家在此方面有其知识特长;古文多发议论,而一归于程朱,故极易蹈入虚空。所以说,汉宋之争与骈散之争,其实就是一回事,是一种冲突在不同领域的体现。

如前所言,在汉学成为时代学术主流后,姚鼐自觉地从辞章转向考据,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古文数量很少。但是,随着姚鼐被排挤出当时的精英主流学术圈又重新回归辞章之后,致力于各地书院讲学,严别骈散,倡导古文,并培育了一批有影响的古文后劲,加之嘉道以后清廷政治意识形态的转移,桐城派及其古文随之影响甚巨。“嘉庆季年,一个以姚鼐为核心的桐城学人群体终于形成。姚鼐意欲捍卫宋学,抗衡汉学,并在辞章领域自成一宗的愿望,庶几实现”<sup>①</sup>。王先谦在梳理这一时期的古文发展脉络时说:

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专家之学,主张后进,海峰承之,遗风遂行。姚惜抱禀其师传,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闾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原文讹作“加”)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百余年来,转相传述,遍于东南,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呜呼!何其盛也!<sup>②</sup>

在此背景下,汉学家,尤其是写作骈文的汉学家,自然不会无视古文的繁荣与桐城派的自是正宗,除了在学术领域与宋学持续辩论外,在辞章领域也奋起与古文叫板,与桐城学人争夺文章正宗。

王达敏认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在姚鼐建构桐城派的历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从这一年起,59岁的姚鼐设帐江宁钟山书院。此前,汉学名家卢文弨、钱大昕先后执教于此,姚鼐主持钟山书院长达23年,学风由汉学渐归宋学与辞章,以姚鼐为中心的桐城派文人团体,主要形成于此期<sup>③</sup>。颇有意味的是,后来为骈文正宗建立理论支持的25岁的阮元,也在这一年进士及第,入翰林院。

姚鼐书院讲学的主要教材《古文辞类纂》,是代表姚鼐桐城派古文思想的经典选本。其《序》云:“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古文不取六朝文,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sup>④</sup>这说明姚鼐厌恶六朝骈文,深受骈文影响的齐梁以后辞赋也摒弃不录。陈平原说,姚鼐是位好老师,不仅因为他编纂了一本可以师范的经典教材,更是借此提供了一种由粗而精、循序渐进的可行的规矩与方法<sup>⑤</sup>。姚鼐尊宋抑汉,严辨骈散,且教学有方,故其弟子大都谨遵姚氏辙轨,蔑弃骈文,以古文为正宗。如弟子姚椿、梅曾亮初好骈文,拜入姚门后,弃骈学散,潜心古文<sup>⑥</sup>。此种现实转变的影响是极大的。

此前的一些汉学家虽推崇骈文,但并非彻底否定古文,或者调和折中。这主要是因为汉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联的骈文一直处于上风,居高临下,与桐城派的交锋中占有绝对优势。嘉道以后,此消彼长,当然消长背后总是存在一个“终极性的权力”。桐城派影响日剧,以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终于忍耐不住,开始从根基上彻底否定古文的正统地位,为骈文争取正统。

阮元自8岁开始研读《文选》<sup>⑦</sup>,长年浸淫于此,熟精《选》理。后与汪中、凌廷堪、孙梅等人交游,提倡经学,倡导骈文,成为清代嘉道之际骈文派的中坚,仪征骈文渐有与桐城古文抗衡之势。

阮元构建骈文理论并以此对抗桐城古文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乾隆五十三年(1788),阮元为业师孙梅《四六丛话》所作的序中表达了对骈文发展脉络的清晰认识,但对唐宋古文尚未加诋斥。他说:

①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197页。

②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49册,第395页。

③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197—198页。

④姚鼐《古文辞类纂·序》,崇文书局2017年版,第3页。

⑤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第220—226页。

⑥梅曾亮云:“某少喜骈体之文,近始觉班、马、韩、柳之文为可贵。盖骈体之文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措,其周旋揖让非无可观,然以之酬接,则非人情也。”梅曾亮《复陈伯游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52册,第483页。

⑦阮元云:“甘泉老儒胡西琴年逾八十而精神强固,为里中诸老之最。余八岁时初能诗……先生亟赏之,即以《文选》授余,因以成诵。”见:阮元《定香亭笔谈》卷三,《文选楼丛书》,扬州阮氏藏版。阮元又云:“元幼时以韵语受知于先生,先生受元以《文选》之学。”阮元《胡西琴先生墓志铭》,阮元《擘经室集·擘经室二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99页。

“自周以来，体格有殊，文章无异。若夫昌黎肇作，皇、李从风；欧阳自兴，苏、王继轨。体既变而异今，文乃尊而称古。综其议论之作，并升荀、孟之堂；核其叙事之辞，独步班、马之室。拙目妄讥其纰缪，俭腹徒袭为空疏。实沿子史之正流，循经传以分轨也。”<sup>①</sup>阮元对唐宋古文，以韩愈、皇甫湜、李翱、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为纲梳理其脉络，评论甚高。“拙目妄讥其纰缪，俭腹徒袭为空疏”，似有批评当时部分汉学家对唐宋古文的指责、部分无知的古文家对唐宋古文学习不到位的意味，评鹭尚客观。究其原因，大约有三：一则其业师孙梅《四六丛话》有调和骈散、骈散合一的倾向；再则阮元时年二十五，虽结交已多，然尚未“主持风会”<sup>②</sup>；三则汉学正兴，骈文复兴，桐城派之影响声势尚未真正成型。

时移世易，变化亦宜。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阮元撰《文言说》，正式为骈文张目。阮元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为理论前提，对何谓“文”从考据上追究界定：

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sup>③</sup>

骈文、散文，一骈一散，均缀以“文”。如何从根本上消解古文的正统地位，阮元从“文”入手，证明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可谓抓住了关键。其推理逻辑是：千古文章之祖是孔子释《周易》而作的《文言》，这是大前提；《文言》不但用韵，而且多用偶，这是小前提；故用韵、用偶者才有资格名之曰文，这是结论。利用这个结论，可证明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千言万语者不是文，是违反孔子之道的，不但不能称为“文”，更不能称“古文”。阮元在证明“何谓文”这个问题上，使用的还是乾嘉学者惯用的考据方法，从训诂入手，追根求源，可谓釜底抽薪。论据既征圣，又宗经，欲使以道统自居的古文学者哑口无言。

为了彻底证明这个问题，阮元还将历史上影响深远、古文派曾经非议的《昭明文选》这部经典选本搬出来，以昭明太子的《序》为依据，进一步申述什么是“文”的问题：

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sup>④</sup>

桐城派先以唐宋八家文为典范，姚鼐《古文辞类纂》编纂后，则以之为不二法典。故阮元以《文选》为依据，特明萧统选文之标准。昭明太子编纂的选本名之为《文选》，则非“文”不选，这是一个基本的立论前提。昭明太子确立的标准是沉思、翰藻，求始有征。阮元再次将孔子奇偶相生、音韵相和的《文言》搬出，此即为沉思翰藻之文，“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佶屈涩语者比也”<sup>⑤</sup>。三个“非某某”者，机锋即指桐城派的古文，三者历史中有专门称呼“子、史、经”，不能名“文”，更不能名为“古文”。该文最后云：

或问曰：子之所言，偏执己见，谬托古籍。此篇《书后》，自居何等？曰：言之无文，子派杂家而已。<sup>⑥</sup>

此数语不仅能说明阮元严别骈散、区划《文选》派与桐城派的界域之意，而且能展示阮元对骈文理论的深入思考以及对抗桐城古文的自觉。

元四十馀载，已刻文集二三卷，心窃不安曰：“此可当古人所谓文字乎？僭矣，妄矣！”一日读《周易·文言》，恍然曰：“孔子所谓文者，此也。”著《文言说》。乃屏去先所刻之文，而以经、史、子区别之，曰：“此古文所谓笔也，非文也。除此，则可谓文者亦罕矣。”六十岁后，乃据此削去“文”字，只名曰集而刻之。<sup>⑦</sup>

①阮元《后序》，孙梅《四六丛话》，李金松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②赵尔巽等《清史稿·阮元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424页。

③阮元《文言说》，阮元《擘经室集·擘经室三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05—606页。

④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阮元《擘经室集·擘经室三集》，第608页。

⑤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第608页。

⑥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第609页。笔者对标点略有改动。

⑦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312页。



阮元最初集子名为《擘经室文集》，此时的阮元对于何谓文的问题尚未深入思考，或者说他对桐城派及其古文尚未正视，当时势促使他思考此问题的时候，他要做的不仅是理论思考，同时还要面对自己已有的实践成果，因此将个人已结集的文集中的“文”字去掉，而分类归之于经、史、子、文。此举不仅是阮元建构《文选》派理论的现实需求，也是对抗桐城的必要策略。故道光三年重刊《擘经室集》时自序说：“余三十余年以来，说经记事，不能不笔之于书，然求其如《文选序》所谓‘事出沉思，义归翰藻’者甚鲜，是不得称之为文也。”因此重编写之，分为四集：说经之作、近于史之作、近于子之作、近于文者<sup>①</sup>。

骈文可谓之文，古文则没资格。阮元以此为骈文争取正统，消解桐城古文的正统地位。古文不能称为文，只能归属经、史、子，而总名为“笔”。刘勰《文心雕龙》中对文与笔的界定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而《文选》中不押韵脚者甚多，为什么还要收入，还名之曰“文”？必须解决这个矛盾，才能使其理论真正成为对抗古文的有力工具。为此，阮元通过与其子阮福的问答，对何谓“有韵”进行了重新阐释：“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押韵脚，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昭明所选不押韵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声音者，所谓韵也”<sup>②</sup>。这就从根基上解决了骈文理论建构中的矛盾。

其实，阮元的逻辑很简单，推理也存在问题，但是抓住了关键，其核心在“文”，通过对“什么是文”的重新界定，意欲从根本上将桐城古文驱逐出“文”的圈子，从而确立了骈文为文章正宗的理论。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深受《文选》传统之影响，在为骈文谋取文章正宗地位的时候，又将《文选》推向前台与中心。如要标宗立派的话，此即为名副其实的《文选》派。因阮元的政治地位与文化影响，他为骈文争取文章正统的理论，通过书院、科举的传播，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 四 《文选》桐城皆去也

嘉道以降，骈文、古文之间的论争依旧往复激烈，双方都没有也不可能将对方彻底取缔，均在争辩中不断吸纳、完善自己的理论。这也是桐城古文、骈文能够持续发展并存的重要原因。从清季的京师大学堂到民初的北京大学，成为桐城派、《文选》派辩论的又一个重要阵地。

最先占领大学讲堂的是桐城派。“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儒缓之失……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sup>③</sup>。桐城古文有所变而后大，一时有复兴之势。满清末造，教育改革，时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因吴氏不久病故，无果。继之者为张筱甫，属阳湖派领袖，阳湖派与桐城派血缘颇近。京师大学堂下设译书局，由严复、林纾分任总办、副总办。民国改元，严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姚永朴与姊夫马其昶、弟姚永概、林纾均以绍述桐城，任教北大文科讲席，姚永概出任文科教务长。因此，清季民初的北京大学，桐城派及其古文一统天下，占据绝对优势，在大学教育中遂举足轻重，一时主宰北大文风，影响整个世风。

1912年，严复辞却北大校长，继任者广引章太炎的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刘文典诸人，以及沈尹默、刘师培陆续进入北大，“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sup>④</sup>。桐城派、《文选》派遂势若水火。据朱希祖1917年11月5日的日记：“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文仿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仿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sup>⑤</sup>

刘师培是仪征人，家学深厚，又深受其乡先贤汪中、凌廷堪、阮元诸人影响，服膺《文选》，推崇骈文。他

①阮元《擘经室集自序》，阮元《擘经室集》，第1页。

②阮元《文韵说》，阮元《擘经室续集》，第1064—1065页。

③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④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⑤朱偁《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文化史料丛刊》第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今《朱希祖日记》并无此年内容，相关内容见于日记所附其女朱倩《孟孳日记》中，语句相同，惟其中云及朱希祖者均为“家君”，时朱倩十四岁，经常替朱希祖抄写日记，故日记中有如此记录。朱偁为朱希祖子、朱倩弟。详参：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389页。



1917年进北大之时，讲授“古代文学”、“中古文学史”等课程。在对抗桐城古文方面，刘师培骈文理论最具建树，大多发表于进入北大之前。其所持论，见诸《文言》、《广阮氏文言说》、《论文杂记》、《文章原始》诸文，诸种理论亦处处体现于其北大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

刘师培的骈文理论与阮元一脉相承。简言之，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何谓文？二是文、笔之别。阮元《文言说》，以孔子《文言》为证，证明有韵、多偶才能称之为文。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从小学训诂入手，引征《说文》、《广雅》、《释名》等书，证明作为文体的文，需“功施藻饰，始克被以‘文’称”<sup>①</sup>，凸显了文“饰”的特质。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刘师培通过征引六朝时有关文笔的文献记载，以类相从，加以案词，以明文轨，力证“偶语韵词谓之文”，“文以韵词为主，无韵而偶，亦得称文”<sup>②</sup>。因立足于具体时代发展，故刘氏所言虽亦片面，然较阮元已更为融通。刘师培以小学为文章之根基，力证骈文为文章正宗，“于是仪征阮氏之《文言》学，得师培而门户益张，壁垒益固”<sup>③</sup>。

刘师培虽主北大文科讲席时间略晚，然其高扬骈文正宗、力诋桐城古文，实则继扬州学派之传统，由来已久。故其批驳桐城派及其古文不遗余力：“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如姚氏、曾氏所选《古文》是也。）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sup>④</sup>，“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sup>⑤</sup>。其褒扬《文选》派及骈文亦竭其所能：“惟歙县凌次仲先生，以《文选》为古文正的，与阮氏《文言说》相符。而近世以骈文名者，若北江、容甫，步趋齐、梁；西堂、其年，导源徐、庾。即穀人、稷轩、穉威诸公，上者步武六朝，下者亦希踪四杰。文章正轨，赖此仅存。而无识者流，欲别骈文于古文之外，亦独何哉？”<sup>⑥</sup>

刘师培1917年秋入主北大文科讲席之时，桐城派另一代表姚永朴宣布辞职，这象征着桐城派从北大的最终退出。故严格而言，在北大的讲坛上，刘师培并未真正与北大的桐城派代表对面交锋，然其文学思想与理论主张对清除桐城派的影响仍具备重要意义。从某种程度而言，刘师培的进入北大讲坛，亦标志着《文选》派彻底在北大站稳脚跟，可视为近代学术转变的一个关节缩影。

黄侃到北大任教是在1914年秋天，推荐人是当时的文科学长夏锡祺，时桐城派代表人物姚永概、马其昶、林纾已于去年离开北大<sup>⑦</sup>。若从时间上考察，黄侃与姚永朴在北大的讲坛上确有交集。

姚永朴在北大的讲义为《文学研究法》，凡25篇，是桐城派文论的系统专著。其门人张玮识语云：“先生论文大旨，本之姜坞、惜抱两先哲。然自周秦以迄近代通人之论，莫不考其全而撮其精。故虽谨守家法，而无门户之见存……其发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龙》。自上古有书契以来，论文要旨，略备于是。后有作者，蔑以尚之矣。”<sup>⑧</sup>此书体例仿《文心雕龙》，引用《文心雕龙》数量颇夥，单此一点，即能发现姚永朴意欲改造桐城派文论的努力与实践。有学者研究表明，姚永朴的文论与刘师培、黄侃并非针锋相对，颇有相合之处。比如有意向汉学靠拢，论文重视小学基础；对《文选》及骈体并不像某些古文家那样愤激，对《文选》学及历代骈文高手丝毫没有蔑视之意，有意统合文笔，消弭古文与骈文之间的对垒，等等<sup>⑨</sup>。

姚永朴对桐城文论的改造，有主动适应文学思想发展、“有所变而后大”的意图，亦与《文选》派尤其是黄

① 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仪征刘申叔遗书》，万仕国点校，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3960页。

②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仪征刘申叔遗书》，第6836—6837页。

③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09页。

④ 刘师培《文章原始》，《仪征刘申叔遗书》，第4927页。

⑤ 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仪征刘申叔遗书》，第4932页。

⑥ 刘师培《文章原始》，《仪征刘申叔遗书》，第4927页。

⑦ 据姚永概日记记载，1913年初就不开课，学校基本不去，11月4日，“大学行毕业典礼，往会，午后归”，从此辞去了北大讲席。参见：姚永概《慎宜轩日记》，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251页。林纾则在4月即辞去北大讲席。姚永概欲南归桐城，林纾先后有《送姚叔节归桐城序》、《与姚叔节书》。后者中云：“庸妄巨子，剽袭汉人徐唾，以扞搢为能，以钉短为富，补缀以古子之断句，涂堊以《说文》之奇字，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侈言于众，吾汉代之文也。伧人入城，购搢绅残敝之冠服，袭之以耀其乡里人……近者其徒某某腾噪于京师，极力排娼姚氏，昌其师说，意可以口舌之力挠蔑正宗，且党附于目录之家，矜其淹博，谓古文之根柢在是也。”庸妄巨子，多认为指的是章太炎，这似乎没有问题。其徒某某，多认为是黄侃。不过从时间上考察，此时黄侃尚未入京。参见：《林琴南文集·瓊庐续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6—17页。

⑧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4页。

⑨ 汪春泓《论刘师培、黄侃与姚永朴之〈文选〉派与桐城派的纷争》，《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第25—28页。

侃诸人的咄咄逼人有关。毕竟,姚永朴是道地的桐城古文代表,故黄侃恐并不曾认真读过姚氏的著作,即视姚氏为桐城余孽,集矢于姚氏<sup>①</sup>,对其竭力贬斥。冯友兰后来的回忆说:“在当时的文学界中,桐城派古文已经不行时了,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晋文(也可称为‘文选派’,不过和真正的‘文选派’还是不同,因为他们不作四六骈体)”,“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黄侃。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我也常去听讲。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sup>②</sup>。

黄侃在北大讲授词章学、文学概论等课程,讲义为《文心雕龙札记》<sup>③</sup>。《文学研究法》是桐城派的文论代表,《文心雕龙札记》是《文选》派的文论代表。

周勋初先生总结黄侃《札记》的成就说:“季刚先生因师承的缘故,和后面的二派(刘师培代表的《文选》派、章太炎代表的朴学派)关系深切。他是《文选》学的大师,恪守《文选序》中揭橥的宗旨而论文,这就使他的学术见解更接近刘氏一边。但他汲取前人的创作经验,参照《文心雕龙》和本师章氏的‘叠用奇偶’之说,克服了阮、刘等人学说中的偏颇之处,则又可说是发展了《文选》派的理论。”<sup>④</sup>

黄侃讲授《文心雕龙》,撰写《札记》,虽为大学讲堂之用,但其中明确寓含着抵御桐城派及古文的意图,故其于《札记》中,常借题发挥,在细致入微地申述刘勰《文心雕龙》用意之时,随时指向“当下”。《题辞及略例》中云:

自唐而下,文人踊多,论文者至有标橐门法,自成部区,然细察其善言,无不本之故记。文气、文格、文德诸端,盖皆老生之常谈,而非一家之眇论。若其悟解殊术,持测异方,虽百喙争鸣,而要归无二。世人忽远而崇近,遗实而取名,则夫阴阳刚柔之说,起承转合之谈,吾侪所以为难循,而或者方矜为胜义。<sup>⑤</sup>此数语虽未有一言直言桐城,然文气、文格、文德、阴阳刚柔、起承转合之语,则处处指向桐城派。章太炎评论此段争斗时说:“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倚老髦,不肯置辩,或语季刚,河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服。”<sup>⑥</sup>看来,黄侃对桐城派的批判是接受了“某人”的意见的。呵斥自然不免,此黄季刚个性使然;以“末流”攻之,真可谓抓住了关键。

“末流”一词,其意至少有二:一曰末期,二曰下流。桐城派从姚鼐开始着意立派,上溯至刘大櫆、方苞,乃至戴名世,迄至民国,已二百余年,虽有中兴、繁盛之时,然以今审之,此确为桐城派之末期,大有“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sup>⑦</sup>之势。对当事人而言,此别无选择。所可批者,唯有变与不变层面。故黄侃于《通变》篇札记云:

文有可变革者,有不可变革者。可变革者,遣辞捶字,宅句安章,随手之变,人各不同。不可变革者,规矩法律是也,虽历千载,而粲然如新,由之则成文,不由之而师心自用,苟作聪明,虽或要誉一时,徒党猥盛,曾不转瞬而为人唾弃矣。拘者规摹古人,不敢或失,放者又自立规则,自以为救患起衰。二者交讥,与不得已,拘者犹为上也……自世人误会昌黎韩氏之言,以为文必己出;不悟文固贵出于己,然亦必求合于古人之法,博览往载,熟精文律,则虽自有造作,不害于义,用古人之法,是亦古人也。若夫小智自私,訾言欺世,既违故训,复背文条,于此而欲以善变成名,适为识者所嗤笑耳。<sup>⑧</sup>

如果单纯从文意上看,未尝不可理解为黄侃纯粹从总体上阐述文之发展进程中的变与不变问题,但如果留意此篇札记末所录《钱晓徵与友人书》一首,黄侃的意图就彻底清晰了。钱大昕的这封书信是对桐城古文的激烈批判,其中云:“方所谓古文学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若方氏乃真不读书之甚者……予以为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此数语足以与此篇札记相发

①汪春泓《论刘师培、黄侃与姚永朴之〈文选〉派与桐城派的纷争》,《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第25页。

②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6、37页。

③栗永清《学科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从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谈起》,《东方丛刊》2008年第3期,第62—78页。

④周勋初《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⑤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3页。

⑥章太炎《文学略说》,《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9页。

⑦班固《汉书·韩安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02页。

⑧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104页。

明，故黄侃云钱大昕此文足以“解拘挛，攻顽顿”<sup>①</sup>，所谓“拘挛”、“顽顿”者，非桐城其谁！

下流即下等。黄季刚批判桐城派，主要是从此层面入手的。一则批桐城古文执泥于法度，关注阳刚阴柔、起承转合等低级技术层面的方法，损害文章自然之美。“蔽者不察，则谓文章格局皆宜有定，譬如案谱着棋，依物写貌，戕贼自然以为美，而举世莫敢非之”，“拘一定之势，馭无穷之体”，“矜言文势，拘执虚名，而不究实义”。二则批桐城派不足以立派，因其所言皆老生常谈，并无新意，不足以成一家之言。黄侃常于《札记》中申述刘勰的观点时，联系“后世”、“近世”有人宣称的文章作法，指出其出于彦和却矜为已有云云。在《原道》篇札记中，对桐城派所标榜的“文以载道”多有不屑，“今日文以载道，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说，本文章之公理，无庸标揭以自殊于人；如后之说，则亦道其所道而已，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三则讥桐城派学无根柢，文无丽词。“尝谓文章之功，莫切于事类，学旧文者不致力于此，则不能逃孤陋之讥，自为文者不致力于此，则不能免空虚之诮”。“然自小学衰微，则文章瘠削，今欲明于练字之术，以馭文质诸体，上之宜明正名之学，下亦宜略知《说文》《尔雅》之书，然后从古从今，略无蔽固，依人自撰，皆有权衡，厘正文体，不致陷于卤莽，传译外籍，不致失其本来”，“奈之何后人欲去华辞而专崇朴陋哉？”<sup>②</sup>

总之，在1910年代北大的讲坛上，以黄侃、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借助《文选》、《文心雕龙》诸书，通过课堂讲学，对桐城派之末流猛烈开火。虽然《文选》派比姚永朴持论更偏颇，“黄侃起而攻击北大桐城派同事，在尚未知己知彼情况下，显得无的放矢、捕风捉影”<sup>③</sup>，但是，黄侃借《文心雕龙札记》对整个桐城派的颓弊揭示与攻诋则大致是符合事实的。正因如此，桐城派在北大的最后一位代表姚永朴黯然离去，桐城派及其古文彻底退出了北大舞台。

以往的研究及学者回忆，大都认为桐城派及其古文最终放弃北大讲坛，是受了刘申叔、黄季刚等《文选》派的猛烈攻击、无力招架才黯然离去的。其实，如果从时间上仔细考究，桐城派之离去，尚有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猛烈攻击的原因<sup>④</sup>。在新旧文化的交锋中，不仅桐城派落荒而逃，《文选》派亦未能幸免。对《文选》派攻击最力者，竟是与黄侃师出同门的钱玄同。

新文化运动者将中国古代文化概括为“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是对清中叶至民国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化的现状做出的反动。“八字纲领”相当准确地囊括了中国旧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响亮口号与得力武器。在追忆20世纪初的这场中国文化的新旧转型中，“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口号对这场运动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已成为显而易见的共识。

## 五 结论

“一代之文章，一代之学术在焉”<sup>⑤</sup>。学术与文章从来就存在某些复杂的关联，将二者截然断开是不可能的，在古代尤为如此，这是由古人的多重身份（文人、学者乃至官员，等等）决定的。

四库馆臣总结中国两千余年经学史时，一言以蔽之曰“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sup>⑥</sup>。从大的层面而言，此判断亦适合于有清一代。乾隆至嘉庆年间，经学考证风靡朝野。服膺程朱之学、致力辞章的姚鼐把握学术脉动，自觉地从辞章转向考据，故其有拜师戴震之举。姚鼐拜师被谢，并没有阻止其学术转向，反而对其转向汉学有直接的推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他绝少古文创作，而是致力于考据。然而，深染宋学背景的姚鼐，即使能够以特别的身份进入四库馆，其考据之成果仍不能被汉学家认同，时常处于被边缘化的窘境。挤进主流学术圈失败后的姚鼐借口生病，离馆出都，致力书院讲学，学术再次转向宋学，并努力构建了桐城学

①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108页。

②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107、115、110、6、189、194、14页。

③汪春泓《论刘师培、黄侃与姚永朴之〈文选〉派与桐城派的纷争》，《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第28页。

④据沈尹默回忆说：“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物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物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两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章氏弟子虽内部分歧，但对旧文学代表的桐城派的抵制上却比较一致。见：沈尹默《我和北大》，第225页。

⑤张祥河《国朝文录序》，姚椿《国朝文录》，扫叶山房1900年版。此《序》执笔者实为姚椿门人桐城派沈曰富，故沈曰富《受恒受渐斋集》亦收录，题名为《国朝文录序（代）》，见：沈曰富《国朝文录序（代）》，《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28册，第177页。

⑥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1页。

派的文统与道统,以之与如日中天的汉学对抗。嘉道之际,汉学已过正午,积弊日显,不仅宋学中人一致诋斥,汉学阵营中的某些学者亦多有反省。惟江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继续扬汉抑宋,方东树则撰《汉学商兑》针锋相对,激辞厉言,专崇程朱,排拒汉学,汉学之盛气始渐衰歇,桐城古文遂兴,则文章之正宗不能无争。于是扬州阮元起而撰《文言说》,以孔子《文言》为依据,以昭明《文选》为典范,力证骈文为文章之正宗,古文不能称之为“文”,更不能称之为“古”,只能归属于经、史、子,而总称为笔。阮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sup>①</sup>。其地位、名望、学识影响力如此之大,毫无疑问会促进骈文的繁荣。

晚清曾国藩借给欧阳劬文集撰序之机,重新梳理了桐城派之文脉传承,对姚鼐之后桐城派的传承梳理至晰。曾国藩身居高位,以义理经济发为文章,流风所被,鲜有抗颜者,其弟子吴汝纶、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推流扬波,晚清桐城古文遂有中兴之势。清季民初的北大讲坛上,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乃至严复、林纾,皆桐城派后期风云人物。随着章氏弟子入主北大,《文选》派、桐城派又势若水火。黄侃及仪征刘师培,补充阐释阮元《文言》之说,以《文选》、《文心雕龙》为依傍,诋以桐城末流,力证骈文乃文章之正宗。桐城派遂退出北大讲坛。时新文化运动已兴,不久,《文选》派、桐城派分别被冠以“妖孽”、“谬种”,成为攻击的靶子,二者遂混于无形。

大要言之,正是因为乾嘉汉学之盛,姚鼐才扛旗立派与之抗衡,遂有桐城古文之兴。阮元又起而排之,将《文选》推向前台,力证骈文为文章正宗,骈文于是兴盛。曾国藩沿波讨源,重构桐城古文脉络,复以经济入文,有所变而后大,晚清文坛则有桐城古文之兴。及章氏弟子入主北大,黄侃、刘师培远绍阮元,复以《文选》、《文心》为依傍,力诋桐城末流,于是桐城古文衰退。章氏弟子钱玄同,反戈一击,诋以“妖孽”、“谬种”,倡导文学革命。有清一代“互撕”不止的两大文派,终于同列,却是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曾国藩曾感叹“道之废兴,亦各有时”<sup>②</sup>,马其昶则云“激则失当,至于相非。一彼一此,犹寒暑之必至”<sup>③</sup>。大要言之,古文骈文、桐城《文选》、文笔之辨,骈散之争,不过汉宋之争而已。《文选》桐城,相斗相争,相辅相成。当二者终于被置于同一阵营的时候,则不过是文白之争、新旧之争,当然也预示着整个古典时代的终结。

汉学与宋学、古文与骈文、新文化与旧文化,其冲突源于其“不同时代的时代性”、“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sup>④</sup>。桐城古文的根基是宋学,推崇程朱之学,标榜韩欧文章,即远绍唐宋。骈文的根基是汉学,汉学以汉代经学为宗。二派虽共处同一时期,却远绍不同,标榜各异,此即其“不同时代性”。

清代经典考据学有个基本预设:大体是经典与圣贤的绝对正确,依此类推,越往前追溯,距离真理就愈近,就越接近经典文本,可靠性越大;反之,从文献源流上越是晚出的,就离圣贤和经典文本越远,离真理也越远,就越可能是某种意图的比附<sup>⑤</sup>。此种“愈早愈正确”的不言自明的考据预设,使清代汉学家及与之密切关联的骈文从一开始就占据某种心理优势,在“绝对真理”在“我”手中的前提下,不仅对宋学的蹈空阐释大加鞭挞,而且对宋学根基的程、朱之学也一并釜底抽薪。故有清一代汉学与宋学、骈文与古文、骈与散、《文选》与桐城的对阵时,后者似乎常处下风。

但毋庸置疑的是,桐城派是清代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深远的的一个流派。究其原因,也正是因为其宋学根基。程朱之学一直是清代官方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故从至高的层面而言,桐城古文主动实现了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合谋,尽管作为一种文学流派、一种文体,它还不足以承担如此宏大的政治伦理使命,但并不妨碍它以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阮元传》,第11424页。

②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41册,第530页。

③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方植之先生传》,毛伯舟点注,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397页。

④ “不同时代的时代性”、“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是西方历史科学中两个基本概念。其中“不同时代的时代性”意为虽然在历史结构与进程上存在日历上的同时代性,却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过去的来源层次。学者用德国漫画家卜劳恩《父与子》中的一幅漫画形象阐释“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说的是父亲给儿子量身高,找了一棵小树,并在树上钉了一个钉子作为标记,看明年能超出多少。结果第二年再比较的时候发现,做记号的钉子比儿子高出了许多。以此说明,虽处同一时代,却有超越时代或落后时代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或层次。从本质上讲,这两个历史学概念都是探讨时代性问题,落脚点都是“当下”,前者侧重于对过去的回归,后者则强调对未来的追求。本文借此概念阐释桐城派、《文选》派以及新文化运动多方面之间的冲突原因。参见: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264页。

⑤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1—382页。

“学行继程朱之后”标榜。从最低的层面讲，桐城古文主动实现了与时文的合谋，“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sup>①</sup>，从而使其最大限度地获取了一般知识阶层的群众基础。总之，古文是文与道之结合，骈文是文与学之结合，其基础则分别是汉学与宋学。故骈文与桐城等一系列相争，归根结底是占有知识的绝对真理与占有权力的绝对权威之间的斗争。

《文选》派被称为“选学妖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目标，究其原因，则为“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新文化运动发起者深受西方新式教育影响，提倡新文化，与追随六朝《文选》的《文选》派虽处同一时代，却存在着“不同的时代性”，一个竭力超越时代，一个努力回到从前。新文化运动的真理预设是：凡新皆以为然，故凡旧皆须清除。所以，尽管《文选》派能够将桐城派驱逐出北大校门，但它仍然免不了被新文化运动驱逐的命运。

##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Wenxuan* School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GUO Bao-jun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significant cultural turns in Yao Nai's life: one is from poetry and prose to academic, and the other is from academic back to poetry and prose. Yao Nai, known for his poetry and prose, wanted to learn from Dai Zhen but was refused. It caused his turn from prose creation to textual research. However, his practice of textual research was marginalized among masters compiling the *Si Ku Quan Shu* forced him back from textual research to prose creation, and finally constructed a Tongcheng literary tradition that rivaled Sinology. The prosperity of Tongcheng ancient prose and the idea that ancient prose is authentic prompted Ruan Yuan scholars to seek orthodoxy for parallel prose by expelling ancient prose from primary school and preface to *Wen Xuan*. The dispute between Tongcheng ancient prose and parallel prose lasted until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ended with Tongcheng School's the withdrawal from the Peking University rostrum. However,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regarded both two sides as typical "evil" or "fallacy" old culture and expelled them. The dispute between parallel prose and ancient prose is essentially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Han and the Song Schools, while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Wenxuan* School and Tongcheng School is essentially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classical and the new academic. All conflicts originate from "same times of the different era" and "different times of the same era".

**Key words:** *Wenxuan* School; Tongcheng School; *Wenxuan* School as the evil; the Qing Dynasty; Republic of China

[责任编辑：唐 普]

<sup>①</sup>钱大昕《与友人书》，《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陈文和主编，第9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546页。